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印章）

合订本 第四十五卷

希望过了8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……
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，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……新中国成立以来前的史料浪值得收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开国至今已经60年了，如果不抓紧，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……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，反映新的情况，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，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发展起来的……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。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……暴露旧的东西，使后人知道老根子，这样就不含割断历史。周恩来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总第
131—
133
辑

文史资料选辑

（平）

合订本 第四十五卷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

艺海生涯

我是怎样成为诗人的/003

◎ 臧克家

步履维艰的从艺之路/013

◎ 项 堃

往事回眸

我所参加的抗日救国活动/021

◎ 刘清扬

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忆旧/034

◎ 郭秀仪

战争风云

我与苏中“七战七捷”/038

◎ 李默庵

整编第十一师进攻山东解放区纪实/049

◎ 杨伯涛

缅甸反攻战役中的新一军/066

◎ 薛庆煜

共和国历程

解放初期北京旧城改建的回顾/086

◎ 陈明绍

研制氢氧发动机的道路/103

◎ 王之任

工商史苑

对资改造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/115

◎ 安冠英

回忆企业公私合营前后/136

◎ 陈铭珊

北京市电机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/139

◎ 柏 岳

新生之路

在植物园劳动期间的溥仪/145

◎ 范增兴

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实录/149

◎ 吴行中

人物述林

钮介臣与湖州丝绸业/159

◎ 钮守章

竺可桢与地理研究所/165

◎ 周立三

名人自述

耄年回忆/171

◎ 张岱年

外交史话

50年代前期中捷友好关系的若干回忆/198

◎ 李清泉

瑞士七年/214

◎ 李清泉

一次神秘的外交使命/224

——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

◎ 唐龙彬

一次震撼世界的外交壮举/232

——接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

◎ 唐龙彬

航天春秋

第一种国产导弹的诞生/240

◎ 林 爽

远程火箭研制片断/246

◎ 梁思礼

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/251

◎ 张贵田

往事追怀

我与蒋经国从友好到决裂/257

◎ 贾亦斌

珍藏文物历难记/291

◎ 吴 徕

人物述林

忆人民教育家俞庆棠/302

◎ 秦柳方

中国近代化学制药业的开拓者赵汝调/308

◎ 钱椿涛 钱昕涛

记祖父李根源抗战初期新疆之行/320

◎ 李成缙

往事追怀

黄埔军校女生队的一段回忆/329

◎ 钟复光

北伐散记/337

◎ 伏笑雨

港澳述往

濠江风云会 赤子报国情/345

——追记澳门同胞抗日救国感人事迹

◎ 陈大白

香港的中文法定运动/359

◎ 黄梦花

航运巨子曹文锦自述/364

◎ 曹文锦

艺海生涯

文艺生涯中的独特经历/400

——记“青年文化列车”

◎ 方掬芬

我骑“毛驴”走天涯/421

◎ 克里木

乡村建设

晏阳初先生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/439

◎ 郑体思

回忆黄巷民众教育实验区/447

◎ 秦柳方

晚清轶闻

晚清重臣李鸿藻事迹述闻/458

◎ 张达骧 李石孙

端王载漪与义和团/471

◎ 毓 运

海外传真

新西兰华侨史（上）/480

◎ 杨汤城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编辑部

编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一三二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我是怎样成为诗人的

◎ 臧克家

臧克家，著名诗人，作家，中国作协顾问，原《诗刊》主编，中国写作学会会长。

以诗集《烙印》、《罪恶的黑手》开始闻名诗坛。他的诗，富有时代精神、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。在艺术表现上，朴素、精练、含蓄，以少胜多。

1929年发表处女作，50多年来，著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回忆录、诗论集《自己的写照》、《运河》、《从军行》、《泥土的歌》、《生命的零度》、《凯旋》、《怀人集》、《诗与生活》、《学诗断想》等50余本。

他说：“生活是诗的土壤，诗是我的生命。”

童年生活——诗的摇篮

如果说，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重大的关系，如果说，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、性情、天才有着极大的影响，那么，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。

我的故乡是山东诸城，位于胶东半岛。这个县属古琅玕，秦始皇东巡，曾在这儿刻石记功，这就是有名的琅玕刻石。我所居住的村子——臧家庄，在西南乡，离城18里路，它孤高地盘踞在一个小岭头上，树木不多，干旱缺水。我家门口，对着两座青山，一座是常山，一座是马耳山。苏东坡在密州做知州时，曾到常山打猎，也写下了“试扫北台看马耳，未随埋没有双尖”的诗句。臧家庄，自然风光并不优胜，但我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我对它的感情是颇深的。

我生在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作为“大清”的一个“子民”来

到这个世界。我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由中而小的地主家庭，但诗的空气很浓。我8岁时，生母便去世了。我的父亲是个神经质的人。他，仁慈、多感、热烈，感情同他的身躯一样纤弱。他对每个人都良善可亲，因此，不论亲疏都对他好。他是一个公子，也是一个革命者，革命使他打一柄雨伞跳下城墙，跌得吐血——以后一直在病榻上侧着身子（连转动的力量也没有了）躺了三年，任病魔之手一扣一扣地扼死了他，那年他才34岁。他喜欢诗，他的气质、感情、天才和诗最接近。我常常怀着悲伤的心情侧耳倾听，听他用颤抖的几乎细弱无声的感伤调子，吟诵着他同我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。那时，他自取号为“石榴花馆主人”，而那位叔叔则名“双清居士”。《霞光剑影》便是他们唱和的诗集名。

祖父和父亲正相反，板着铁脸，整天不说一句话，说一句话就像钉子打进木头里一样。没人不怕他、躲他。但他也特别好诗。白香山，他最喜欢。有时，他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，用湍流的热情，洪亮的嗓音朗诵起《长恨歌》，接着又是《琵琶行》。他的声音使我莫名其妙地感动，不是他的声音，是他诗的热情燃烧了我幼小的心灵。这时，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曾热心地教我读诗，“自君之出矣，不复理残机”的相思情，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借秋风”的咏蝉诗。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，今日回味起来，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。

我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而巧嘴的人，她没能够好好受过教育，但却那样富于文艺天才。她常讲《聊斋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西游记》给我听，还有那些仙女和凡人恋爱的富于诗意的故事……它们，常引出我的眼泪和幻想，像在心上打上深深的印记，永久也不能磨灭。

我，就是父亲的一帧小型的肖像，我是他生命的枯枝上开出来的一朵花。他给了我一个诗的生命。那时节，我还不了解诗，但环境里的诗的气氛却鼓荡了我蒙昧的心。

说到对于诗的兴趣，我还有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。他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——六机匠。

六机匠，是我家的佃户，也是远房的亲戚。光棍一条，屋子里一张织布机，一张锄。他的房子，就是我的家——灵魂的家。六机匠，是一个讲故事的圣手，他记忆力强，描绘能力也强，能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、形象地、诗意地、活叶鲜枝地送到你的眼前来，好像展开一幅图画。他的材料是掘不尽的宝藏，而且常常花样翻新。赶一次集回来，他便会把从说大鼓的口里听来的故事增枝添叶地、更生动、更好地说给你听。他说故事往往用韵语和腔调唱出来，伴同着表演般的神态和姿势。他是用热情，用灵魂的口来说这故事，以安慰自己和别人。故事，就是他的创作，诗的创作。听的人，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里去。在他的屋子里，我认识了许多灵魂；在他的屋子

里，我得到了盎然的诗趣；在他的屋子里，我熏陶出一颗诗心。

六机匠，他把诗的苗子插在了我心的田地上。

然而，生活中并不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，它也有着严酷惨痛的一面。那时，在我的小眼睛里，也印下了许许多多悲惨的故事……

我们的村子里，除了减姓以外全是贫农。他们虽然姓名各异，但身受的剥削和生活的酸辛却是一样的。他们的生死之权都掌握在拥有百顷膏腴之地的大地主手中。一有不满，地主便大发雷霆：“揭锅、退地、封锁门！”那些穷苦的农民，穷得冬不见棉，春不见粮，“上吊找不到一根绳子”。他们拥有的只是一条奴隶的身子。

有一位令我终身难忘的农民，他就是在我家干活达50年之久，我们四辈人同呼“老哥哥”的老李。他青年时代就踏进了我家的大门，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都叫他“老哥哥”，我也叫他“老哥哥”。我小的时候，他已经老了，地里的活干不了了，只管喂喂驴，扫扫地。他对我和善极了，陪我玩，讲故事给我听。他常带着今不胜昔的感慨，讲我们“荣华富贵”的家史，讲我祖父、父亲小时候央求他讲故事时对他说的话：“老哥哥，这时候你对我好，长大了挣钱养你的老。”然而，现在我祖父、父亲早已当家做主，成了“老爷”，而那时给他们讲故事的“老哥哥”，也变成“老李”了。我常见到祖父铁着脸，冷言冷语地指责老哥哥，而老哥哥总是无言地、迟缓地退出门去，我深深地为老哥哥感到不平。终于有一天，祖父借老哥哥烧炕烧糊了一只鞋的机会，狠心地把他从我家赶了出去。我满眼泪水地哭着送他走，走了一程又一程。他没有家，他在我家干了一辈子，走的时候，只背了一个小包包——他劳动一生的代价。他走向何处？他投奔的那个穷得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的侄子怎么能养活得了他？我站在山坡上，望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远了。我止不住眼泪。我多么爱我的老哥哥啊！然而，我却留不住他，因为他年老，无用了。这件事，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，它使我模模糊糊地领略了当时黑暗的社会，认识了人生。

我从小就和穷孩子一道玩，我和穷人之间没有一条界线。我同情他们，我热爱他们。在泥里土里风里雨里，作为野孩子队伍里的一员，我14岁以前几乎没有离开过乡村一步。

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，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。同时，淳朴、严肃、刻苦、良善……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。

这些，你可以在我的诗的内容上、形式上，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——那么鲜明耀眼的佐证。在多少支笔下，我成了“农民诗人”（我多么高兴接受这一顶冠冕）。

我爱乡村，因为我生在乡村，长在乡村。我爱泥土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泥土的人。



青春的热血——孕育出诗的萌芽

1923年，我进了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，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。

那时，统治山东的军阀——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，对人民实行文化统治和武力镇压。他残酷屠杀革命者，怀抱“张”字大令的宪兵队日夜在街上逡巡，“冷的刀光直想个热的人头”。在文化上，他提倡尊孔读经，不但自己亲自兼任大学校长，而且拉出许多文化僵尸出任国文教师，让早已被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打倒的“孔家店”借尸还魂。老而不死的前朝遗老，弹冠相庆，在“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”的暮年，得到最后一次宣扬孔孟之道的机会。像我们的一位国文老师，昏庸而口吃，讲《孟子》：“孟子，邹、邹、邹、邹……人也。”一个“邹”字“邹”了5分钟，真令人可笑，可憎，可怜！

张宗昌的文攻武压并没有吓倒革命的人们。革命的新思潮像地下运行的烈火，越烧越旺。我们的校长王祝晨先生是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，他学习蔡元培先生新旧共蓄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，使我们的学校成了新生力量的滋生地。我们班的同学们，几乎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。下课以后，各人忙着去干自己更重要的“功课”——有的人到工厂去了，有的人到大门口给民众讲演去了，有的人开会去了……

反动的黑暗的势力教给我们怎样战斗。同时，有一座神秘的文化宝库，灯塔似的，太阳似的，给了我们光与热，指点与慰安。它，便是我们的“书报介绍社”。那里面的书籍杂志那么多，那么全，令人爱不释手。那时，不管你穿的是布袜子、老土鞋，《创造》、《洪水》、《语丝》、《沉钟》……每人都总有一份。我的更多，杂志之外，新书有好些，特别是诗集。

这时期新诗读得很多，穆木天、冯至、汪静之、韦丛芜……然而，撼动了整个灵魂的却是郭沫若先生。他的创作、翻译，我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去，它像一股动力，一道热流，一阵春风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生命的脉搏跳动在沫若先生的字里行间。我崇拜他，我从一本杂志上剪下他的一张照片贴在我的案头，上面题上：“沫若先生，我祝你永远不死！”

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，我是非常激愤的。我时常同二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，让风吹散开我们的头发，高歌狂吟，像立在理想的王国里，向不醒的人间吹送我们诗的“预言”。我们也时常在大明湖上飘荡，身子互相偎依着，听小船冲开残荷，唰唰有声。暗空无月，寒星闪闪，静夜冷清，孤舟湖心。我们一面饮酒，一面狂吼，发出高歌，声裂如磬之夜。

对反动军阀的满腔愤慨，促使我给当时主编《语丝》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，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。过了不久，这封以“少全”署名的

信，连同岂明（周作人）的复信一起被登在《语丝》上，还被加上了一个题目——“别十与天罡”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。

这时候，我写下了不少的诗篇。我写得多，全凭我的大胆！我写得快，因为我事前既不作绸缪的苦思，事后又不下工夫删改。“灵感”是我的唯一法宝，它一动声色，我就在纸上“走笔”。我觉得写诗并不难，因为还不够知道它难的资格！

这一时期，可以说是“模仿时期”。读了别人的诗篇，仿佛那里边涵蕴着的感情原来我心上就存在着一样，立刻就兴奋起来，也想以同样的内容自制一首。模仿，在刚踏上习作初步的阶梯时，是无可非议的，而且有时还是必不可免的。但是，模仿，不能叫自己落到别人的套子里去，不能叫别人的阴影淹没了自己。模仿，我自己应该是主人，别人是供我采用的对象。可悲的是，那时，我跟在别人的后边跑，却把我自己失掉了。

在说到我走上新诗创作道路的时候，我必须提到一个人，他就是我的族叔、诗友——臧亦蓬（笔名“一石”）。

一石是个怪人。他写了10年诗，然而10年的心血却是一张白纸。他在北平读书时，把吃饭的钱硬省下来印书。宁肯叫自己的肚皮挨饿，这样，他快乐，他安慰。然而，当他把凝结着自己心血的诗集拿去请教胡适、鲁迅、梁实秋等先生时，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批评，甚至否定。但是，他并没有灰心，还是起劲地写着，写着。

可以说，我不遇见他，也许一辈子也“遇”不见新诗。没有当年的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

亦蓬大我三四岁，长得很魁伟，我叫他四叔。他见了不足与谈的人，沉默木讷，但和知心朋友在一起，则高谈阔论，插科打诨。我们在封建气味浓厚的农村，卓尔不群，狂傲不羁，用奇特的怪论和行动抵抗封建习俗，因此，他得到了一个绰号“四癫”。

一石写诗，都是有感而发，风格朴素，全用口语，毫无雕饰痕迹。

我从城里回来，
迎面碰着小弟弟
从牛棚里出来，
面目枯黑。
走进内房，
看见父亲在那里吞云吐雾^①
剥削我们一家人！

① 注：吸鸦片。

这就是他的诗，直抒胸臆，毫无顾忌。

不管他怎样怪，怎样“癫”，他是形体，我就是影子。学校放假时，我们常常跑到僻静无人的林边，崖下，去对坐半天。有时话多得使双颊发烧，有时默默地半天无语，听风号，听虫叫，听大自然神秘的语言。在春天，也远足到陌生的小村落，在夕阳的返照下，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张望的少女的身影，像望着一尊诗的女神，一直望到人影被黄昏抹去，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。心的小船在诗湖中摇曳着。

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明节，燕子新客似的刚刚从远方飞来，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，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。灵感借了我的手，在这个佳节的诗境里写下了我的第一首新诗：

秋千架下，
拥挤着玲珑的少女；
但是，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。

一石看了，比我还兴奋，他惊奇这诗的第一朵花竟是这样美丽！对于最末一句，他说了一大串“好”。他鼓励我，给我打气，好似他可以给我打保票，只要我写下去就一定能成功一样。

确实，对于我，他从没吝啬过鼓励，怂恿，改正，指导。他的一间小草屋，便是我们“幽会”谈诗的“乐园”。这是诗的世界，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。

但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，实在还被关在新诗的大门之外。

中学生活还未结束，政治空气就变得更为紧张了。风传军队要来学校搜查，我们半夜三更撬开地板，把所有带白话标点书全部塞下去，用脚踩一踩，仿佛踩自己的心一样痛！信件、日记，仓皇中付之一炬。心，火一样地燃烧！

高压把我仇恨的心磨锐了。恰巧，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新的文艺理论——《文学与革命》落到了我的眼底，它给了我力量和希望。这样，投出“此信达时，孙已成万里外人矣”的充满豪言壮语的一纸家书，我便同几个朋友从寒冷中向着自由与温暖的江南飞去。

1926年的10月天，北国正是金风肃杀，万卉凋零，一片凄凉景色。而当我们踏上了武汉的大地，却见大地一片葱绿，用青眼迎人。当时心里发问：“谁的手把宇宙割成了两片，南方是白昼，北方是黑夜？”

在黑暗中掩藏已久的眼睛，突然被照亮在光辉的太阳之下了，身子是一条小船，荡漾在大时代的怒潮里，心也是。1927年，我考上了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”。军校校址，在武昌的西湖书院。大门两旁，一副对联“党